

档案面对面

与解放军档案馆合办

史海拾珍

给“心门”上把“锁”

■解放军档案馆 吴 萌

现实生活中，给门上锁是常识；对党员干部的内心世界而言，同样如此——各种诱惑、腐蚀纷繁多样，如果“心门”上没有“锁”的制约，就可能溜进“病毒”和“杂质”。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奉命开赴河南项城地区，与冀鲁豫军区一部合编为17军，其中32旅改编为50师148团。整编期间，新入伍战士、起义改编人员大量加入，部分人员缺乏严格的革命纪律教育，享乐思想、本位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病毒”侵袭着这支队伍。2月7日，148团印发的《团委会关于反对享乐腐化思想，发扬艰苦作风，保持党的纯洁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成为帮助官兵

关好“心门”、抵御诱惑的一把“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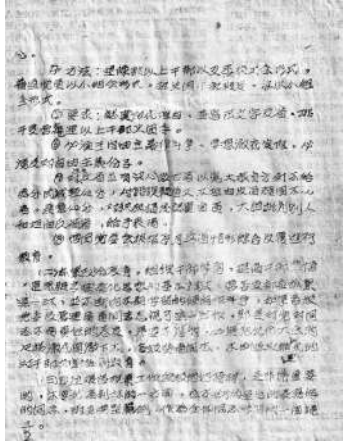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上这把“锁”，《决议》开篇明义：“入城以来，部队产生了严重的享乐腐化思想，特别在某些干部中表现更为严重……”指名道姓点出了八连副排长刘继山、通讯连军械员李学章等人存在的违纪问题。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和人民群众的高贵品质，严重破坏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腐蚀了党的组织纪律和战斗力。长此以往，“将造成我党我军失掉在人民中之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因此，非进行思想整编、组织调整不可！

他们将“反对享乐腐蚀，发扬艰苦朴素，保持党的纯洁”提高到“全团党的政治任务”的高度，上升到纪律层面，提

出4项核心措施——

首先，要定期检查纠偏。每月以党日为节点，按照排以上干部、普通党员、机关干部几个层级，以小组会、支委扩大会的形式，检查思想表现，分析危害及诱因，制订整改计划，并要求人人坦白反省，撰写文字材料。明确“对坦白反省并有决心改正者以宽大教育方针，不给处分或减轻处分；对错误较重又不坦白反省顽固不化者，严重处分；对积极揭发认真负责，大胆批判别人和坦白反省者，给予表扬”。

其次，要强化政治教育，以组织干部学习为抓手，营支部具体落实，党委及营连领导对干部“采取轮回式的加强个别教育”，通过压实责任和按需施教，



“向不愿学习的倾向作斗争”。

他们还坚持榜样引领，持续表彰先进同志，打造典型范例，供全体成员对标学习。如此一来，抽象的纪律规矩具象为身边榜样的示范引领，更有利于推动形成崇廉尚俭的正向循环。

而对逾越底线红线的顽固分子，对“仍不自觉，明知故犯，流氓成性，腐化透顶者”，他们秉持严肃态度坚决处理，绝不姑息，让铁纪“长牙”，让铁规“带电”，以维护纪律的权威性。

上图：1949年2月7日，148团编印的《团委会关于反对享乐腐化思想，发扬艰苦作风，保持党的纯洁的决议》内页。

资料图片

| 现往知来

山高路远有人管，小事小节也要纠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党委副书记 杨 磊

胜利在即，也不能有一时一刻放任思想滑坡、作风松弛，这是148团《团委会关于反对享乐腐化思想，发扬艰苦作风，保持党的纯洁的决议》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时间，没有特殊情况，没有特殊人员，必须管好管严——好比我所在的单位，驻守在深山之中，各点位分布广、人员编制也不多。营区偏远，上级来实地检查的次数有限，时间久了，个别官兵产生了懈怠思想，对纪律的尊崇和敬畏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几年前，我对各个库房开展巡查。在某库房，我看到保管员小吴独自进行库房勤务作业，而且当天的作业记录还没有填写。按照纪律要求，军械库房必须执行双人双锁、全程留痕的管理制度，库房作业必须有两名保管员同时在岗。了解情况得知，小吴和小王共事多年，互相信任，便滋生

了临时替班、补写台账等不良行为。我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要求立即整改。

深入调研，我又发现了不少问题隐患：警勤分队有执勤战士值班时不够专注；保管军械物资分队官兵进行日常库区巡逻时，不够细致严谨；在军需物资领用环节，有人想着简化流程，图一时方便……

这样的思想倾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相比其他单位，上级来咱们这儿的次数不算多，但这不代表组织对我们的关注度低。”党委会上，大家达成一致，必须立即纠治管理松散、作风松懈、纪律松弛的现象。

148团整治不良风气、抓实思想教育的工作经验，给了我启示。我召集党委班子成员集中研讨，确定以每季度安全形势分析会为契机，组织全体人员分层开展自查自纠，并定下纪律教育学习时间，以分队和班为单位，压实责

任链条。

针对经费开支、军需采购、工程建设、岗位调整等关键环节，我们重新细化管控流程，制订奖惩制度。班子成员分片负责各个点位、各个分队，不定期随机抽查，定期和官兵进行一对一谈心提醒，每周办公会集中讲评问题。对于多次提醒依旧不改、明知违规还要触碰红线的人员，一律依规严肃处理。

我分片负责的一个点位，地处深山腹地，很少有机会参与重要任务。那次，我到该点位走访，发现本该参加集体学习的保管员小张却在库区整理物资。

我没有指责，而是和他一起工作，了解他对纪律教育的看法。“点位这么远，而且我不是领导干部，手中没什么权力，觉得上不上教育课无关紧要。”小张的看法，代表了一些基层官兵的错误思想。我从他最关心的工作内容入手，

结合岗位实际，和他分享了多个违规违纪的真实案例，讲清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的必要性。

身处偏远点位，手中权力不大，不代表标准可以降低、规矩可以放宽，更不是心存侥幸的理由。我们始终牢记148团先辈定下的准则，立起“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法规意识，对违规行为绝不姑息——单位有一名分管后勤的资深军士骨干，被查出履职不严、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被依规问责。

持规以恒，守纪如铁。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成为大家的行动自觉，没有人再琢磨走捷径、搞变通。

从泛黄的历史档案中，从单位抓纪律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我深刻感悟到：地理位置再偏，作风导向不能偏移；单位规模再小，思想防线不能失守；人员资历再深，纪律约束不能缺位。

（张林整理）

讲述者 第76集团军某旅干部 臧乾雯
聆听者 第76集团军某旅纪检监察骨干

曾经的功臣犯了罪，是顾念往日战绩和情分放他一马，还是不留情面追究到底？

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1937年风雨飘摇的延安——全面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封锁奔赴革命圣地。10月的一个清晨，延河河畔的一具尸体打破了解放区的安宁。嫌疑人很快被锁定，却让人唏嘘不已：犯下恶行的，竟是被寄予厚望的红军干部黄克功。

革命征程中，黄克功经历的硬仗恶仗何止一场！他十几岁便投身革命，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长征途中血战湘江、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每一战，他都不曾退缩。

26岁，黄克功便一路晋升为红军高级将领，是组织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法律天平的另一端，是来延安求学的进步青年刘茜。二人相识相恋，可相处日久，矛盾逐渐滋生，刘茜不愿继续交往，决心终止这段关系。黄克功却心生执念，几番纠缠逼迫，最终拔枪射向刘茜……

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真的没有一丝理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难道他不清楚，肆意杀人是滔天重罪吗？不，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依然选择以身试法，说到底，不就是觉得自己是个“领导”、是个“人物”，有特权摆平罪名吗？他自恃走过雪山草地、历经烽火硝烟，狂妄而又天真地认为，满身伤痕就是资本，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身份，能让自己拥有超脱法纪的特殊权限。

案件很快传遍延安，一时间议论四起。有人认为功可掩过，功可抵罪，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谋杀，应处以极刑。很快，毛主席收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写的信，信中报告了案情和自己的处理意见。几乎同一时间，毛主席也收到了黄克功的求情信，请求“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

10月11日，公审大会如期举行。被宣判死刑后，黄克功仍提出革命需要人才，希望自己能死在战场上。这时，一匹快马送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是“赦免信”吗？或许那个时候，黄克功心底还残存一丝幻想。直到信的内容被当众宣读，字字严厉的告诫传入每个人的耳中——“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一声枪响，黄克功倒在刑场。刘茜的亲友，在案件发生数天后，便等来了公正的审判。反观国统区那边，面对类似情况的吴海兰亲友，却没能等来那声正义的枪响——1935年9月，蒋介石的爱将张宗灵因猜忌妻子吴海兰，悍然持枪杀妻。事件曝光后，各界

他没有等来那封『赦免信』

群情激愤，联名上书要求严惩凶手。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将张宗灵判处监禁。但这场审判终究流于形式：关了1年后，张宗灵被秘密释放，改名张灵甫，后来竟晋升为师长。

一个是“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个是“张宗灵这个人作战很有本事……莫不如让他出来戴罪立功”。看似是两桩案件的处置，实则是两种道路的抉择。民心向背，在一次次公正与偏私的选择中清晰可见。

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我们当引以为戒，在军衔和职务提升的同时，决不能欲随官长、贿随权集，甚至知法不守法、严下不严上，严人不严己，当牢记：一旦违反纪律规矩，任你再有再大的本领、再多的功劳、再高的官职，都等不来“赦免信”。

“好传统”故事会



| 瞬 间

图①：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图②：2020年8月，武警贵州总队六盘水支队组织军士选晋工作，为确保考核公平公正，支队纪委派出工作组全程监督执纪。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点 睛

法网密织 监管无隙

如果说纪律监督就像一张网，那么第一缕丝线，从90多年前便开始纺就——

中共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一词，设立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仅1个月，便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时代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一次次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职责任务进行完善……

这张“网”越织越密，成为守护党的肌体健康、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的坚强屏障。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有隐患早排查、早消除，避免了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这张“网”越织越密，“贪腐之欲”“不正之风”等再难藏身，踩“红线”、越“雷池”者，无论事情大小、职位高低，都难逃法网。

（朱思源整理）



品读任弼时的“三怕”

■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干部 陈 望

追“星”者

成长至今，你有没有怕过什么？驻守在任弼时同志的家乡，我从任弼时的成长足迹中，“听”到了他的回答——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越深入品读“三怕”，我越感到，这看似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实则暗含一名党员对权力的谨慎戒惧——那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念头、没有身处“法外之地”的错觉，始终秉持不要享受而要奉献、不要放纵而要约束的自我要求。

1946年，任弼时的小女儿在延安仓库看中一个小本子，管理员顺手赠予。任弼时得知后立即责令归还，严肃告诫：“咱们不能搞特殊化。”1949年进京后，任弼时住处临街嘈杂，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给他安排了一处较为安静的房子，他却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房管处要给他换新家具，他说旧的修修补补还能用。他还要求孩子们到大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经常询问夫人菜金是不是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如此种种，简直把“特殊化”当作天敌。

时至今日，每一名党员、军人，依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去年，我调任支队政治主管不久，接到一名老战友来电。他希望我“关照”一下他的亲属，我直言“不敢”。

我想起任弼时面对妹妹为妹妹求职的请托，同样是拒绝：“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我们“怕”的，正是人情对制度的侵蚀、私谊对公义的消解。

与革命先辈相比，我们还会面对形式更加隐蔽的诱惑：一些企业以“联谊”“交流”为名频频邀约，言辞恳切，意在拉关系、走后门。为此，我们支队党委带头形成“三不赴约”共识，着力净化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看似限制了交往，实则是为权力运行修筑“防火墙”、系紧“安全绳”。

“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这是任弼时对子女的告诫，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铭刻于心的誓言。1948年，任弼时身患重病，却一直坚持工作，医生让他多卧床休息，他对医生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

肩负的责任，让他“躺不住”，也让我们更敬畏——有一年，支队计划更新一批基层文化设施。在公开招标采购环节，有人建议简化流程，理由是“基层急需，不能等”。这种“为效率让路”的变通，看似合情，实则暗藏风险。我当即表态：“只怕速度慢，难道就不怕藏污

纳垢？”最终，我坚持按规组建评审小组，严格公示采购需求，全程录像留痕，确保每一环节可追溯、可监督。

正是因为我们的一切待遇、职务、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因此每一个决策、每一次用权，都必须经过“公心”的严格过滤；在政策范围内，选择更审慎的方案；在人情与原则冲突时，坚决站在原则一边；在无人监督时，依然恪守纪律准绳，不能因“熟人”而放松标准、因“急事”而简化程序、因“方便”而突破底线。

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为，无所不为。彭德怀“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杨善洲“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杨业功“就怕自己有触犯党纪的苗头自己不知道，别人不提醒”……工作中到底“怕”什么，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怕追责，更怕工作不负责；我怕出格，更怕能力不够格。

